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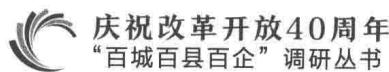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百城百县百企”调研丛书

改革开放与中国县域发展

(中 卷)

本书编写组



改革开放与中国县域发展

(中 卷)

本书编写组

目 录

改革
开放
与
中国
县
域
发
展

C O N T E N T S

上 卷

海北 淀京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	1
通北 州京	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	41
开济北 发技京 区本经	科学规划谋创新 一张蓝图绘到底	71
延北 庆京	生态领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106
和天 平津	百年底蕴与高质量发展	139
武天 清津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	178
正河 定北	“半城郊型” 经济的发展与主要经验	203
新河 区海沧	推动绿色发展的四个维度	233
右山 玉西	从荒漠之地到塞上绿洲的生态奇迹	262
满内 蒙古 里古 界科	我国最早开放的最大边境陆路口岸发展之路	291
尔内 中德蒙 族石古 界科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	325

辽宁省 营口市	“神州第一开发区”引领改革发展的创新实践与探索	360
辽宁省 北票市	从困境走向新生	391
吉林省 吉林市	立足边疆实际，秉持绿色发展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419
吉林省 珲春市	自力更生：边境开放转化就地发展	445
黑龙江省 富锦市	立足资源优势，推动主导产业，发展与保护并重	483
上海市 徐汇区	新时代 新家园	509
上海市 嘉定区	开放、创新、融合与高质量发展	535
江苏省 江阴市	中国县域经济领跑者	575

中 卷

江苏省 吴江区	新发展理念引领“苏南发展新模式”	603
江苏省 张家港市	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县域样本	651
浙江省 嘉善县	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县域经验与启示	680
浙江省 安吉县	践行“两山”理念的先行者	718
浙江省 诸暨市	“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时代标杆	750
浙江省 义乌市	“国际小商品之都”崛起的经验与启示	778
安徽省 凤阳县	从“大包干”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	822

金安徽 寨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老区脱贫振兴	853
晋福 江建	中国特色县域现代化的成功探索	886
长福 汀建	水土流失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917
井冈山 江西	不忘初心 率先脱贫	945
婺江源西	发展全域旅游，建设最美乡村	987
曲山阜东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1027
兰河南 考南	“兰考之问”的新时代答卷	1064
大湖治北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	1099
长湖沙南	兴产惠民高质量发展领跑中西部	1127
韶湖南 山南	红色圣地的不忘初心和与时俱进	1155
花湖南 垣南	精准扶贫之路	1186
南广沙东	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成功范例	1214
深广深前 合服港东 区业代海	“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	1242

下 卷

顺广 德东	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精神催生的发展奇迹及启示	1275
东广 兴西	跨境经济助力兴边富民	1301
琼海 海南	机遇之下的先行	1336

澄海 迈南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做强做优特色产业	1360
江重 北庆	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	1392
渝重 北庆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生态圈建设	1423
南四 江川	绿色发展打通秦巴山区脱贫攻坚之路	1462
汶四 川川	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典范	1490
湄贵 潭州	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生态化	1531
万贵 山州	绝地重生，强势转型	1564
瓮贵 安州	民生为本强改革，共建共治促发展	1594
腾云 冲南	内陆“极边”县市如何以大开放促大发展	1635
卡西 若藏	走向脱贫可持续之路	1665
米西 林藏	西南边疆地区稳藏固边、富民兴边的启示	1702
富陕 平西	绿色发展之路	1730
敦煌 甘肃	以文化旅游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1776
民甘 勤肃	治沙治贫实践与可持续发展探索	1805
互青 助海	四策并举，打赢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攻坚战	1835
化青 隆海	“拉”出幸福人生	1870
盐宁 池夏	金融扶贫的做法与启示	1894

改革开放
与中国县域发展

江苏吴江



新发展理念引领“苏南发展新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

吴江，20世纪30年代，因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江村（即开弦弓村）进行经济社会调查并写出《江村经济》而闻名于世；80年代，又乘改革开放的春风，执“苏南模式”之牛耳，开风气之先。进入新时代，又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先行探索。

改革开放40年来，吴江立足实际、锐意创新，成功闯出了一条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引擎、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载体的“吴江创新发展之路”。总结吴江的发展经验，既是对“苏南模式”创新发展的梳理，更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总结沿海“先富”地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做法与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根据中央宣传部统一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全国“百县（区、市）大调研”。在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同志带领下，本调研组一行9人于2018年6~7月间到吴江进行调研，很有感触和收获。一叶知秋，管中窥豹，吴江40年的发展变革，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

本次调查采用了文献法、座谈会法、观察法和问卷法等研究方法。调研组走访了亨通集团、恒力集团等10余家企业；调研了盛泽镇、齐心村等10多个特色镇村；考察了社会治理联动中心、太湖生态保护区、太湖雪蚕

桑文化园等社会、生态、文化建设项目；召开了 10 余场座谈会；按照社会学抽样原则共发放问卷 2640 份，问卷回收审核检验后得到合格问卷 2278 份，其中城市社区问卷 835 份，农村社区问卷 824 份，企业家创新精神调查问卷 619 份。

一、吴江概况

(一) 自然风貌和历史文化

吴江现为江苏省苏州市辖区，为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南连浙江，东邻上海，西濒太湖，为长江三角洲中心腹地，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太浦河横穿东西。区域面积 1176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 267 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 22.7%。吴江区下辖 8 个镇，国家级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同里镇、省级汾湖高新区与黎里镇、省级吴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与盛泽镇、太湖新城（省级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与松陵镇实行“区镇合一”发展。

吴江于公元 909 年建县，1992 年撤县设市，2012 年撤市设区，是享誉全国的“鱼米之乡”和“丝绸之府”。吴江文化秉承了吴越传统，长期以来，受浙江的“鸡毛换糖”经商文化、苏州的“家园林”文化、上海的新潮文化等影响，养成了含蓄、坚韧、平静、亲和的民风和勤勉诚信的业风。吴江人既有积极进取、追赶潮流的奋斗精神，又兼有居壶中天地、不与世争锋芒的静思心态。在现代化过程中，吴江文化孕育了一大批社会英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南社爱国诗人柳亚子、陈去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院士程开甲，都出生在吴江。2017 年吴江籍两院院士共有 9 位。这些国家英才为吴江文化增添了璀璨的现代科技元素。

(二) 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吴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桨声船影里的传统“鱼米之乡”，发展成为一座经济高度发达、社会

和谐公平、生活富足便利、环境美丽乐居的现代化城区，是中国区域率先实行现代化的一个样本。

2017 年，吴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89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 3 万美元，分别是 1978 年的 526.6 倍、447.9 倍；全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3.5 亿元。2017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58830 元、29754 元，城镇化率达到 80.0%。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 1.82% 低位运行。吴江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 8 位，全国工业百强县区第 18 名，在苏州市排名第一、江苏省排名第五，^①其盛泽镇位列全国千强镇第 10 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口来吴江创业。2017 年，吴江总人口 183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83.3 万人，而外来人口达到 99.7 万人。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吴江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推动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加快基层治理创新、不断增强人民福祉。在教育方面，吴江区推进集团化办学，2017 年末，全区各类学校总数达到 195 所，在校学生数为 17.4 万人，教职员数为 1.1 万人，生师比达到 15.7 : 1；在卫生事业方面，吴江努力推进医联体建设，努力优化健康资源，2017 年末，医院床位数共计 5921 张，卫生技术人员数为 7226 名，按地区实有总人口计算，每万人床位数和每万人卫生人员数分别达到 32.4、39.5。^② 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82.6 岁（2015 年末）。吴江积极发展养老事业，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达到 40 张，镇（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实现全覆盖。

生态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巨大成就。吴江通过开展环太湖生态区建设，集合产业生态化整治、村镇绿色改造，走出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之路。吴江区不断创新基层参与，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专业化，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保持高水平，全区实有人口万人发案数保持全市最低。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工业百强县（市）、百强区发展报告》，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10513813_119562，2018 年 7 月 7 日。

吴江区先后荣获中国人居环境奖、国家生态市、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等称号。“吴风越韵，精诚致远”的城市精神得到弘扬，城乡日趋一体化，城乡公交、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就业充分，社会和谐，“乐居”成为这个城区的标签。

二、“苏南模式”的形成与转型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调研和总结了吴江县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发展的经验，提出了“苏南模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闽江模式”并称为地方改革开放的最具代表性“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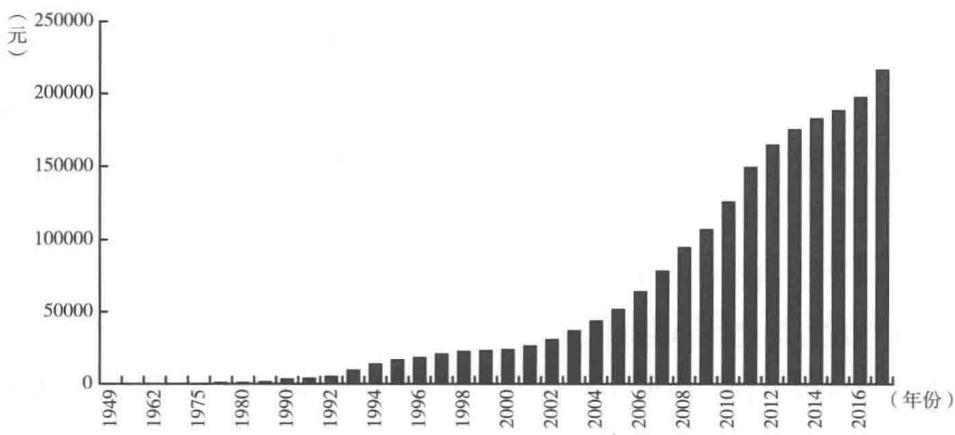
（一）“苏南模式”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吴江县经济增长动力长期不足。第一，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1949~1975年，全县人口数量从48万人增长至70万人，增长了近1.5倍，但非农业人口的占比从16.9%下降为9.17%。吴江自古“六分耕地四分水”，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仅为1.57亩（1976年）。在农业技术没有明显进步的情况下，农业人口的增长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农民增收缺乏基础条件。1962~1975年，开弦弓村某生产队平均产出从0.63元/劳动日缓慢增长至0.66元/劳动日。^①第二，资本积累不足抑制了经济增长潜力。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资本投资缺乏足够的承载空间。1962~1975年，吴江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从91万元增加至154万元，年均增长率仅为4.13%。第三，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缓慢。在“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吴江县的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都受到了严重限制。非农部门的萎缩造成了社会分工单一化和逆城市化，技术进步迟缓。

^① 数据来源于《开弦弓村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增长动力不足导致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增长缓慢。1949~1975年的20余年间，吴江县人均生产总值从157元增长至368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仅为3.33%；职工年平均工资从407元增加至453元；1962~197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12元，仅增长为125元，几乎陷于停滞。1961年，开弦弓村的人均收入仅为80多元，到1976年，人均收入也仅为120余元。

图1 吴江人均生产总值



改革开放天地宽，幸福生活靠实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吴江村社工业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中蹒跚起步，发展壮大，正是吴江人民在党领导下靠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大胆探索。

1. 以改革和企业家精神为动力的现代化之路

改革开放初期“苏南模式”的形成，主要来自两股动力的交汇。

一是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的创新活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审时度势，推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放活”政策，包括：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①1983年政社不分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的人民公社制度逐渐瓦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推广，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对分离；基层乡镇政府要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中央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重大改革，打破了限制农村工业化的制度束缚，激活了孕育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潜能。1984年和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①明确“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之后，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帮助农民扩大生产、提高效益的政策，乡镇企业的发展驶入快车道。^②

二是自下而上的企业家创新，开辟了市场化改革的可行路径。在初生但又不够完善的市场环境下，如何创造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条件？吴江的实践与做法，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找准需求缺口，补齐经济发展“短板”。依靠原有基础，为满足市场之所需，依靠村社副业，逐步发展出轻纺工业和手工业企业，奠定了吴江经济起飞的基础。例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开弦弓村就办有丝绸加工企业。1978年初，该村再次筹集资金，购买织机，重新创办丝织厂，扩大了生产。

其次，搞活企业经营机制，培育企业家精神。县乡两级政府坚持“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原则，创新社队工业企业经营机制，积极发挥在农村的退休工人、下乡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的专业技能和联系城市的中介功能，提升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草根工业”的发展壮大，还培育了吴江企业家群体。经过市场化的启蒙和洗礼，这批跟市场经济共同成长的“草根”企业家，成为吴江经济腾飞的中流砥柱。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中发〔1984〕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中发〔1985〕1号）。

② 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到1983年底，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人民公社或生产队所有和经营，一般称为“社队工业”。到1984年底，全国9万余个人民公社改建为乡（镇）政府，90多万个生产大队改建为村民委员会，“社队工业”相应地改称为“乡镇企业”。

再次，立足吴江发展吴江，跳出吴江发展吴江。利用靠近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以及毗邻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和杭州等大中城市的区位优势，主动对接大中城市的资源，积聚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设备、订单和市场，通过跨区域生产协作、产学研合作（“周末工程师”）、联合经营、产业链延伸等方式，推动城市工业向县乡转移，培育出了通信电缆、机械装备、化工、建材等当时的新兴产业。

最后，地方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形成了和谐的政企合作关系。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乡镇企业是乡镇政府重要的经济支柱，是支持农业生产、改善乡村面貌、发展社会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吴江地方政府为支持工业发展，逐步完善与产业发展相配套的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委派能人到乡镇企业任职，并推动地方分散的技术、管理、流通、金融等农业服务体系转型为支撑工业发展的服务体系。

2. 以乡镇企业发展为引擎的农村工业化创举

改革开放前，吴江经济潜在增长率难以实现，人均收入陷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

1956年底，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吴江逐步形成了公私合营、国营、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性质的工业（手工业）。在集体工业中，又逐渐形成县属集体、乡镇村（街道）集体工业。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年），吴江县农村地区利用集体积累的小量资金，创办了一些初级的小型手工作坊式社队企业。在全盘计划的经济体制下，社队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原材料、能源、市场、分配制度等束缚，生产时起时落，销售时好时坏。到20世纪60、70年代，大中城市的工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商品供求缺口较大，而农村局势相对稳定，工业设备、技术、产能开始向农村地区转移。吴江依托靠近大中城市的区位优势，开始承接城市的产业转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逐步放开，社队工业成了振兴农村经济的主力军。吴江县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创办起来，一时间“处处点火，村村冒烟”，“无村不厂，无村不工”。在“计划本子”之外的社队企业，迅速推进与大

中城市的企业及县属骨干企业的合作，加快了技术设备改造步伐，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1980年，推行了“五定一赔奖”制度，^①1983年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1984年全县社（队）镇工业企业实行“一包三改”，^②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乡镇企业中实际存在的“铁饭碗”“大锅饭”和干部终身制问题开始得到解决。1986年，全县落实经营承包责任制的乡镇企业占总数的99%以上，1987年推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以考核企业经济效益为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20世纪90年代后，全县乡镇工业企业都实行了“生产要素承包，资产滚动增值”经营承包责任制、集体承包户和租赁制等，提升了企业经济激励。

体制机制的放活，对乡镇企业的发展立竿见影，吴江由此踏上了一条以农村工业化为起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1978年，吴江社队工业企业达到1402家，年产值达12766.92万元，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是1976年农村社队工业总产值的3倍。1984年，乡镇企业数量达到2283家，在1978年的基础上新增了2/3。企业的行业分布，也从过去农业初级产品的加工制造业，拓展至机械、电子、冶金、化工和建材等行业。到1997年底，五大支柱产业在全县乡镇工业经济中的比重已达到80%。

吴江乡镇企业的突飞猛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吴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1978年，吴江工业总产值仅为41509万元，是农业总产值的1.57倍。到1994年，工业总产值增长至345.4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80余倍，是农业总产值的15倍。1978年，全县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5.4:36.0:18.6，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到1994年，三次产业比调整为13.4:60.6:26.0，第一产业占比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占比接近2/3，工业化驱动的结构调整特征十分明显。第二产业的

① 即定产量、质量、产值、成本、利润，超奖减赔。

② 即全面实行经济承包合同制，改干部任免制为聘用制、选举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

发展，还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兴起，从事经营商业、饮食服务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农民人数迅速增加。农村工业化将吴江从一个“鱼米之乡”，转变为工业化新城。

第二，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1975年，吴江有社（队）镇工业企业626家，年产值3367万元。1978年，全县有社（队）镇工业企业1402家，年产值12767万元，是1975年的3.8倍。1990年，乡镇工业占全县工业的比重达到71.4%。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吴江乡镇企业迎来了新一轮大发展，一批龙头骨干企业迅速做大做强，如恒力、盛虹、亨通、鹰翔等企业在全国都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1997年，全市组建79家乡镇企业集团，乡镇大企业占吴江乡镇企业资产的50%，实现利润60%左右。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提升了市场竞争水平，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

第三，形成了“一镇一品”的产业特色布局。农村工业化还促进了产业集聚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丝绸纺织和通讯电缆两大支柱产业。各乡镇积极发展特色产业，金家坝的彩钢板、菀坪的缝纫机、横扇的羊毛衫、黎里的日用化工、七都的铜加工、莘塔的电梯、桃源的服装等在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累积了一定的地域知名度，形成了“一镇一品”的产业特色。

专栏一 改革初期的吴江县盛泽镇

1978年改革开放后，盛泽镇的村办丝织厂遍布全镇各村，形成了中国鹰翔集团、江苏艺龙集团等一批全国知名的企业。1986年10月，东方丝绸市场应运而生，形成了纺织产业的专业贸易市场。该镇连续6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创汇“五强”乡镇，真丝绸出口量占到全国的1/6，成为国内主要的丝绸出口基地。1990年，盛泽镇、村两级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0.42亿元，位居当年全国5万余个乡镇之首。

第四，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吴江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巨大的资源集聚能力，提升了吴江的开发开放水平。1990年，全县进出口总额仅为320万美元。五年后，全市进出口总额飞速增长至52700万美元，增长了近165倍。尤其是吴江纺织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高，外向度较高，较早融入国际市场，技术结构和产品档次不断提升，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外向型发展还拓展了吴江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视野。

3. 以小城镇复兴为载体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在改革开放之前，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均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农村副业在“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下被限制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趋于消失。传统承载商品流通功能的小城镇逐渐衰弱：全县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小城镇人口却出现了下降。1949～1975年，全县总人口数量增长了48%，非农人口数量却下降了24%。

改革开放后，在乡镇企业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带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使得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小城镇复兴，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起点。

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用工需求，吴江县当地农民为提高收入水平，出现了“离土不离乡”的职住关系，即在不改变居住地和户籍地的情况下，就近在镇上或乡镇企业从事季节性非农业工作，改变了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以工补农、以工养农”，促进了城镇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城镇化。

从全县范围看，小城镇是这一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主要载体。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对吴江县十来个小城镇的历史和现状做了调查，总结了小城镇的五种类型，反映了这一时期吴江小城镇发展的基本状况。^①第一种类型是以震泽镇为代表的农村经济中心，其主要特点是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在这里集散，作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能够将周边的乡村连成一个区域市场。第二

^① 参见费孝通《各具特色的吴江小城镇》，《瞭望周刊》1984年第2期。